



不知道农村 就不知道中国的国情 不了解村官 就不了解中国的农村

村官通鉴

村官的世界是中国“三农”的百科全书

于江山◎著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for Village Leaders

对官来说他是民，对民来说他是官。

以史诗的笔法歌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三农”的巨大变化。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村官”这一群体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艰辛。对中国“三农”改革的历程，对中国社会、民族人格进行积极的反思。是诠释中国国情，揭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道路的力作。作者跟踪中国北方农村三十多年，浓墨重彩地为中国农民唱响了赞歌。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

于江山◎著



村官的世界是中国「三农」的百科全书

村官通鉴

著名跨界学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国学管理研究所
所长于江山教授力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官通鉴 / 于江山主编.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3. 3

(国学的大地)

ISBN 978-7-5162-0304-0

I. ①村… II. ①于…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4359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全案统筹: 刘海涛 严 锴

责任编辑: 胡玉莹 辛德晶

书 名/村官通鉴

CUNGUANTONGJIAN

作 者/于江山 主编

出 版·发 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电 话/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 真/63055259

http: //www. npcpub. com

E-mail: mzfz@npcpub.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开 710毫米×1000毫米

印 张/21 字数/270千字

版 本/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刷/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书 号/ISBN 978-7-5162-0304-0

定 价/38. 00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总序

跋涉在国学的大地上



(一)

进入国学的天地，是偶然也是必然。但不管是命运的偶然还是人格履历的必然，似乎都是一种文化的命定。

20世纪60年代末叶，我从山东的一家中等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故乡的农村教学。先是小学，继之初中，最后是高中。总之是把那时的基础教育经历了一遍。

正是后青春的年龄，虽然处在形势大好而万马齐喑的年代，思想上还是洋溢着一股献身世界革命的豪情。当时农村学校的教与学是附属于政治活动和劳动的，所以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挥霍。干什么呢？读书。毛选四卷已读得滚瓜烂熟了，许多篇章都能背下来。《鲁迅全集》也啃了好几遍。1973年以前，《红楼梦》等古典名著还是禁书，也就是说除了当时的教材，再也没有什么中国的书可读了。幸好1970年以后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有机会接触到马恩列斯的许多大部头著作。有一天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通讯员骑自行车来学校下通知，让我们去公社领书。到傍晚，校长就和另外两位老师各骑一辆自行车，驮回来三纸箱的书。打开纸箱一



看，全是马恩列斯的著作，有全集选集精装书，也有简装的单行本，白皮红字，鲜艳夺目。

这些书都放在我的宿舍里，因为学校穷，老师们两人公用一张办公桌，时常被学生的作业本占得满满的。而我是体育教师，住在器材室，里面有废弃的水泥乒乓球台，正好可以放下这一批革命导师的著作。从此以后，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进入了一个为期三四年的读书季。

算起来我30岁以前的读书生涯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4岁开始一直到初中毕业，上小学以前被伯父逼着背书，从“三百千千”开始直到后来的《十三经》。上学后，特别是学会汉语拼音以后，就开始读“小人书”，60本的《三国演义》是十几个同学靠挖狼毒、刨小草根、捉山蝎、掇蝉蛻等中药材攒钱买齐的。二年级后就开始读大部头的《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记得还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但从此养成的嗜读习惯却在中学和中师阶段屡受科任老师的斥责。在家里，“手不释卷”也常常引起母亲的唠叨。因为迷恋阅读，耽误了不少打柴、割草、剗野菜的工夫，而这三项又是我们那时候所有孩子不能不做的“功课”。在农村，男孩子从来就是当牲口养的，因为将来要顶家过日子，所以念不念书不要紧，能不能干农活才是最要紧的。5岁剗野菜、捡干柴，8岁割草，10岁锄地，12岁挑水，16岁推独轮车，等等。这好多程序都是约定俗成的。假如有谁家的男孩到了一定年龄还不会干什么活儿，那一定会受到乡亲们的笑话，小伙伴当然对你瞧不起，大人们也透露着鄙视，婶婶大娘们则开始发愁一个不会干农活的男孩子怎么能找上媳妇？我们家乡时兴娃娃亲，大约在剗野菜和割草的年龄就大部分被拴上了定亲的红绳子。

我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虽然身体发育很好，但由于活儿干得少，所以多少有些技术含量的农活、家务活都会让我有些力不从心，推车（掌握平衡）、刨地（左右换架）都成了弱项。娘很着急，生怕我将来没出息，所以初中毕业时坚决不让我继续上学了。正好伯父去世，再也无人督促我背经典。眼看我的读书生涯就面临夭折。后经过我不

断抗争，又及时搬来了舅舅劝说，娘终于松了口，通过爹告诉我：只能报考不拿学费、管饭吃的学校。

这真是别无选择，我终于走进了师范学校的大门，准备将来做一名小学教师。

师范毕业时，毛主席又有新指示：小学附设初中班，中学附设高中班，这样解决农民子女就近入学的问题。好在那时候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工学农，也要学军，知识课倒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批师范生就水涨船高地从小学教到高中。

在高中时我教体育和英语两门课，那时已经隐隐觉得英语是另一个世界，引得我无限向往。通过一台三用机，我每天晚上偷偷听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后来辗转托人买来了《灵格风》3本教材和密纹唱片。等我把900句和灵格风都背诵如流的时候，突然觉得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学校的英语教材好可怜，那些自造的“红卫兵”“革委会”“三结合”“贫下中农”等专有名词实际上无用，除了国人以外的英语世界根本弄不懂“批林批孔”是什么运动，而我们还在乐此不疲。

从那时，我就升腾起一股走出国门的冲动。

所以到后来，我怀着一腔激动踏进欧美大陆，一待就将近10年。

在国外，我曾经如入宝山，满目惊奇。巨大的文化差异冲击震撼着我。我不遗余力地急于想与国人分享我的感悟。较早在国内开讲MBA和EMBA，觉得一旦这些西方的管理工具被掌控在我们手中，中国就会发展，特别是各级各类管理都将旧貌换新颜。我自己也有一段时间特别自信，自觉得学贯中西，会通古今，好像真是个人物似的。

自信被撞得粉碎时，是我走上企业高管的岗位以后，那是一家近万名职工，几十亿元资产，股东结构多元的上市公司。人心浮动，官司缠身，内债外债，貌合神离，谣言经常淹没真相，决议往往被传闻证实。这时候我从西方管理理论中学到并得意洋洋的诸如战略规划、决策流程、实施监督、资源整合、资金分配，等等等等。高头讲章和冠冕堂皇通通在一夜之间无效了。有一段时间整得我疲于应付，狼狈



不堪。晚上静下来，涌上心头的却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词组：浴血奋战。这哪里是在当老总啊，简直是遭洋罪——因崇拜洋管理而受的中国罪。

好在我像传说中的猫一样有九条命，总不会死的。我明白，这是我在农村被当作牲口一样养活积淀下来的生存基因。这段管理战场上的水深火热让我惊悚，让我深省，让我从混战中抬起头来，开始抖落某些洋面包的碎屑，开始明白许多人类的文化品种移植到中土来会“水土不服”，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脱胎换骨，凤凰涅槃。

思路一变，局面也随之明朗，本来准备花一年时间把治理结构理顺，结果我用了40天便大功告成，走上正轨。局内人、局外人都大部分都傻了眼，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神助，给当初拿着铁锤、榔头往工厂外赶我的职工灌了迷魂汤，让他们反过来成了我的拥戴者。之后的老长时间，我一直顺利地扮演着胜利者，直到企业换了东家。

这一段经历在我的生涯中关系重大，因为碰壁后我开始理性地进入关于中西文化或曰文明的思考。诸多原来清晰的分野开始融合，重迭，渗透，变成一片温润的混沌，混沌内不停地翻滚，奔涌，聚散。我知道这是一场不无痛苦的交媾，双方或者多方都在频频变换着自己的操守和诉求。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场不无痛苦的交媾，才催生出“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的潮流，为一个东方古老文化的复兴和西方复合文化的东渐拓出了一条新径。

正是在这条新径上，我开始了风雨兼程地跋涉。

在国学的大地上。

（二）

21世纪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升温的国学热，最直观地反映了民族复兴的文化诉求。虽然理性的氛围十分稀薄，但民心折射出方向。处在转型期的巨大震荡中，中华民族几乎是本能地抓住了国学——这一旨在自我救赎的精神缆绳。

国学就这样被使命——被赋予为民族复兴提供支撑和提领的文化使命。

说实话，这就是国学的宿命，与生俱来的宿命。

回望一下人猿相揖而别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孤儿。而一直以来为这位孤儿提供生存发展条件的，正是国学。

是的，国学原本是很强大、宽泛、无孔不入的，只是到后来，才被人为地规范所狭隘、单薄，甚至被固化为竹帛上的文字或纸面上的经典。

现在，让我们重光国学的本来面目吧！

国学是中华文明的源流之学与源流之用。

源流之学的最小外延也应包括三大潮流，一是浩如烟海的国学经典；二是融化进民众心理深处已化作集体无意识的价值观念；三是以风俗为主要载体的、在民族生存发展中无处不在的信仰。

除三大潮流之外，还有随着疆域不断扩展，异胞异文化不断交往而被同化和反同化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也在不断充实着国学的内容，拓展着国学的领域。例如，麦、薯、棉、玉米、辣椒等作物的输入，胡琴、唢呐、琵琶、壁画等艺术的东传不胜枚举，早已经化成了国学的部分。胡琴中的二胡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岂不知二胡的祖先在西域，但是在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二胡文化在中国，也只在中国。

总之，上述三大潮流皆为中华文明的源流之学，但这只是国学的一翼。而国学的践履性所决定的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伟大实践，则是比源流之学更为直接具体，更为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另一翼。源流之学和源流之用的互相渗透和生克组成了国学的主体。

我们崇拜中华文明的源流之学，我们更看重与我们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源流之用。中华民族实质上是一个实用理性的民族。

在国学热从隐到显的历程中，质疑和反对之声始终不绝于耳，某些“有关部门”也囿于各种原因而不作为。但这些没有阻挡住国学的



升温，不仅燎原了中国，而且把孔子学院等弘扬国学的机构开到了全世界，大有国学之光普照全球的态势。

大凡世间之事皆有表面繁华而内景窘迫的状况，特别是当这件事还在发轫之初的时候。情绪上的胜券在握和理智上的实力较量是两回事，所以对于国学的振兴，也不可轻言胜利。

因为国学大军从开始就表现出素质、社会地位、主张诉求、路线方向以至目标宗旨的不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们在国学热中大相径庭的表现。

如果要粗略归纳一下的话，目前驰骋在国学天地中的主要是学院派与江湖派。

如果要细致条分一下的话，则派中有派，各具千秋，姚黄魏紫，美不胜收。

这些年国学界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很是热闹。并且还将继续热闹下去。但形势大于内容，符号淹没实体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或许是国学灵魂面临的诱惑太多的缘故，不少“国学大师”及其课程开始大幅地膨胀，君临天下目空一切，普天之下非我莫属，渐渐地与市场 and 利益卿卿我我起来，于是国学也渐渐地成为奢侈消费。另一支“大师”队伍则把国学中的玄奥发挥到裂变聚变，奇门八卦堪舆先知等都各显奇能，仿佛要主宰世界。一般的人做不成大师，但可以埋头苦干一些自以为是弘扬国学的善事，各地的书院、学堂甚至私塾家塾此伏彼起，都在国学招牌下勤勉地耕耘，在他们眼里，国学是人类文明宝库中最珍贵的财富，只要把社会拉近国学，那就不愁小康能变成大同。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很多。本书对多年来国学天地中的翱翔者、开辟者、耕耘者、摇旗呐喊者通通致以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合力合力，共同开辟了一个让国家扬眉吐气的时代。

除此之外，《国学的大地》书系还有自己特殊的使命。

之所以将本套书系以《国学的大地》命名，包含着对当前国学热的一个基本估价：那就是，国学大军的将士们过多地装点了国学的天

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国学的大地。

一个民族当然需要仰望星空的高士，但同时也亟待耕耘大地的农夫。

今天的中国才真正走进了五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社会转型已渐入深水，由经济崛起到文化再造，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道德沦落和灵魂扭曲，这些“软武器”已经在民族躯体上造成了硬伤，拖拽着我们的理想航船沉重地沦落下去。

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唱着高调沉落，而应该脚踏实地来一次沉重的崛起。

任何学术都应该以“资政利民”为最高宗旨，因此，我们选择了《国学的大地》。我们宁愿在大地上跋涉，因为只有在大地上，才能书写中华民族的大历史。

(三)

因为我主张把国学定义为“中华文明的源流之学和源流之用”，所以我的人生践履主要在学和用上张罗，在由“内明”到“外用”的历练中沉淀了许多如鱼饮水的冷暖，帮助我管窥了社会、时代的烛光斧影，也让我隐隐约约感知到了我们的民族人格。不知鲁迅大师笔下的“民族性”是否指此，但肯定与我的“民族人格”有许多重迭或共指。算起来鲁迅大师西逝已经近八十年了，他的许多话语还在今天回响，我有时感到一种冷冷的悲。但随即又想到人类的基因改变大约需要一万年为周期，也就不那么焦灼了。让人类慢慢地进化吧，我们只需好好地利用我们的有生之年。

接下来又有了一个新的疑惑：以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国学天地，到底能有多大的作为，虎口再大也吞不了天吧？何况我也没有膨胀到自诩为龙虎。人定胜天的口号是喊了不少，到头来谁见把天挨过！看来还是本分一些好。

我认为关于“源流之学”不用我操心，因为这个领域高手如林，许多位都是我心悦诚服的大家巨擘。国家拿了那么多钱，耗散了那么



多人力物力，主要就是打造这个“源流之学”。至于“源流之用”情况就有些闪烁，因为一提到“用”，就会与市场产生一些暧昧，所以不少能量就在“用”字上做足做大了文章，也算是天罡地煞群雄毕至吧，当然也有些鱼龙共舞。比起“学”来，大概“用”的天地里环境保护的空间可能更大一些。按说我本来会本能地逃离，但人一旦年龄大了反而生出一种不知基于什么的执拗，或许这就叫自信，总而言之，我自愿走进这“源流之用”的江湖，一混就是数年。数年间，只经营着一方小小的地盘，但我还是称之为国学的大地。

我知道学和用是不可分割的，但我以为“学”不能拘泥，“用”一定要通达。对于国学来讲，不管是学和用，“回到古代”都不是我们的目的。在学通了的基础上，把国学“现代化、大众化”才是今天的当务之急。

在《国学的大地》里，我秉承着“资政利民”这一宗旨，对于资政，我仅有理论上的权利，但缺少体制上的资格。但权利既有，那就不妨小试。虽然“位卑”，仍不忘“忧国”啊，这种又臭又贱的传统我身上还有不少。那就再贱一次吧，因为我明白我所有的“忧国”皆是以民为本。

于是选定了《国学的大地》第一批书目。

《国学的大地》十二本，大体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来铺排：

除《国学的大地》是阐述我对国学的一揽子观点以外，其余十来本可粗分为五种内容。

第一，管理类著作，即《中国化管理》书系。这是我专门写给官员们的一套书，因为在我眼里，支撑着共和国这个巍然体制的，不是别人，正是从上到下的官员。党务官、政务官、事务官和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的管理者组成了一张政治与管理的恢恢大网，这是让共和国不断前行的保障。因此，提高他们的素质，扩大他们的视野，帮助他们提升领导力是资政利民的重要内容。所以我精心打造了这门课程，并认真编写了《总论卷》《内明卷》《外用卷》《修身卷》和《致心和卷》。这次出版的是《总论卷》和《内明卷》。

《中国化管理》之所以选择管理哲学为建构领域，其一是为了对应和接济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管理科学；其二是因为中国化管理的文化特质就是超工具化。应该说，管理哲学和管理科学在管理实践中都不可或缺，所以作为一名官员必须要有两把刷子。其实在当今的中国有两把刷子也不一定够用，因为还有若干的诗外功夫需要修为。另外，中国的老百姓两眼都盯着官员的行状，为此我大声喊出了“官清天下和”！

第二，养生类著作，我认为这是最实际的民生。养生大潮的水有点浑浊，我力图做一点儿文化上的澄清，同时在我有限的的能力范围内提供一些实操性的内容。这类著作除《大道养生》是概论之外，《黄种人喝黄酒》是我较偏爱的一书，对于帮助国民建立健康的主流生活方式会有一定裨益。《观天籁》《读玉》则是艺术养生的具体化，而我把“个性化、生活化、艺术化”看成是养生的三项根本原则。

第三，修身类著作。《孝行天下》是“以孝启德，以德树人，以人兴国”的起点，也是已经化入民族性格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孝文化的稀薄和异化是当今社会最大的尴尬，孝文化的复兴则是重建民族道德大厦的奠基，孝文化在个体成长中无疑是道德大门的锁钥。所以我选择了以孝为题，我愿意在这场文化的博弈中用孝做领军的旗帜。《女人的功课》是《母亲教育》和《精彩女人》两书内容的重新整合。当初，出版这两本书是基于对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的焦虑。当“女人”这个世间最美好的本源被形形色色的理论所绑架之后，就会只剩下对女性天地的功能性解读。以至于众多的姐妹被歌颂、被吹捧、被呵护着做了甜蜜的殉道。现在这两本书整合以后以《女人的功课》崭新问世，提出女性一生“四个角色”（女儿、妻子、母亲、公民）和三大工程（美丽工程、智慧工程、幸福工程），相信会引起姐妹们的重视和社会的刮目相看。

第四，应用类著作，即国学在国民精神生活领域的应用范本举隅。《失去锁链之后》是对文学艺术和学术领域中人、书、文、事的评论。这批文章大多数已在报刊上发表，力图以中国人的语言和中国



式知人、论世、论书、论文的路径来展示一种理论的审视。由于平时痛感于评论界的西化、专门化和歌颂模式充斥着视野，与理论的使命“支撑和引领”相去太远，所以我努力想写出一番新气象。至于《江山韵语》是我多年来支离的创作实践和搜罗辑梳的联语、文牍的合辑，大概能达到趣味性和实用性的璧合，一书在手随时可查可用。

第五，以“三农”为题材的《村官通鉴》。这也是我多年来最沉重最致力的著述。有说不尽的中国就有说不尽的“三农”。中国的“三农”放到人类文明的大谱中，也是沉甸甸的一章。我选择村官入题是找到了接近“三农”的桥路，让我永远能保持着一份距离和理性。否则，假如我一头扎进“三农”，我会长歌，长哭，长久地沉湎，我怕我没有那么粗砺的内心以应对那些无情的现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三农”已经有了很大地改善，但“三农”还要过大关，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农”的底色就是中国的国情，我不希望读者把这本《村官通鉴》看成是一部普通的报告或者文学。如果说《国学的大地》中许多著述都披沥着笔者的心血，那么《村官通鉴》的书里书外，则饱含着许多人的泪水与心声，不仅是我。正因为我对中国“三农”的未来持有乐观的期望，所以我不惮笔墨来状写它今日的拮据。

《国学的大地》是一个开放型的书系，首批这12册小书只是搭起了一个稚嫩的框架，更多支撑和完善有待以后不断地拓展和积累。我内心的愿望是：以我和同事们的努力，在国学的大地上耕耘出一片片令人喜悦的丰收，并让这丰收嵌进像轮作一样良性的轮回。为了这个心中的愿景，我们辛劳在这方古老的大地上，一度忽视了此前那漫长艰难而又愉快的跋涉。



繁华中的回望——历史选择了李德海

我从农村走来，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倘若让我讲讲农村，我却常常找不到语言。不是没有，而是太多太多，当千言万语霎时间汇聚一起欲狂泻而出的时候，何处是它的喷口？相信同时代的伙伴们都会有这种感觉，久而久之，倒好像真的无言了。

其实，找不到喷口，毋宁说是一种幸运，因为不用承担误读或更大篇幅的解释。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历来缺少代言人，即便是颠覆历史开创新纪的惠农利农政策，也大都是制度的安排，是自上而下的恩施。在顶层设计的冥想中，“三农”已进入初步的繁华，但受惠者此刻在想什么，他们拾级而上的台阶在哪里，他们的鞋子是否夹脚，凡此等等，很少能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事实上，他们并非真的没有声音，而是没有被分配到传输的频率，才导致了整体的失语。当然这毕竟是前进中的缺憾，是美中不足，白璧微瑕，假以时日是会圆满的。

但是，现状对我们这些已经谋生在都市中魂牵梦萦在故乡故土的“三农”之子们，却每每感到尴尬。父老乡亲的命运已化作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逼仄让我们感到心惊肉痛。但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微言轻，说出来自于事无补，然而不说却胸垒高筑，就这么上上下下



地挣扎着，转眼间我们也到了须发如雪的年龄，有些力不从心了。

于是我们中的大多数放弃了语言，开始经营起一种躯体与思想的制衡。是啊，我们既不愿喷薄的岩浆把自己染成灰烬，也不愿随波逐流把自己席卷而去，我们选择了一脸的矜持与平静，任地火岩浆在心中奔涌。

这是不是变节或是虚伪？我有时也自问。

但仔细考量，又觉得不是。因为在繁华中选择沉默充其量是一种文化妥协，而文化妥协只是生命的变通，这或许是社会达尔文教给我们的生存艺术。

鲁迅先生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那是面对万恶的黑暗势力。但今日不同了，我们将在沉默中获得永生。

生存艺术也是多元的，就此事来讲，有乡愿的艺术，也有狂狷的艺术，当然还有沉默的艺术。我有时十分瞧不起乡愿，也不愿沉默，而宁愿去领略另类艺术的狂狷或狂狷的艺术。我无此天禀，所以常常寻找意中人。

我确实曾经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觅过，但在我的交往圈子里往往不能胜意。正当我要彻底封存这种人格的理想时，共和国的大变局开始了，显示改革继之开放，而农村率先沐浴了改革开放的明媚阳光，春光下一群震撼人心的、鲜活的、古老而又全新的形象映入我的视野。

这就是村官。

村官的称谓，颇含几分暧昧。有时是缀满鲜花的桂冠，有时是透出寒酸的破毡帽。由于“皇权不下县”，所以村官本算不上什么官，历代史册上，很难找到他们的痕迹。

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天上地下、良莠不齐、参差披拂的群体。正是他们，支撑着“三农”这片广阔的天地。元曲曾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国家或兴或亡，最苦的都是黎民百姓。而如果以孟子“民本”思想去看老百姓的历史作用，应是“兴，百姓事；亡，百姓事”。此乃“载舟覆舟”之谓也。草根黎庶是国家社稷的基础。

村官，作为百姓的组织者，他们顶天立地的地位，更不可等闲视之。共产党是天，老百姓是地。他们上承中央及各级政府的法规指令，下管老百姓的前途命运及衣食住行。职责之明确，使命之神圣，操劳之艰辛，是任何一个层次的官级群体所无法替代的。如果没有他们，说不定真要天塌地陷，尽管有了他们也挡不住天塌地陷，但他们硬是顽强地伫立于天地之间，可谓共和国的中流砥柱。

诚然，村官群体中，确有个别顽劣不规者。在中国，高官、村官皆有腐败，文化根源所致，见常不怪。但这无碍于村官群体的神圣与荣光。我们无法抹煞村官们的强大存在和辉煌业绩。因为他们纵然脸上写满了九亿农民的辛苦，心里仍鼓荡着共和国在改革开放中前进的风帆。他们虽没有官品，但却有不少人在“做无品官，行有品事”（李德海语），的确不乏“小舞台上的大人物”。实在是可感可叹，可歌可泣！

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回望中国农民、农村、农业坎坷悲壮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之路，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一代同样坎坷悲壮的村官。

这样，我们的回望和反思，便找到了路径。

于是，我选择了写李德海，并由此进入“三农”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目的是给当代后代的村官们树起一面镜子。

我认为，这就是李德海的意义。当然不是全部。

改革大潮，万舰竞发，百舸争流。弄潮健儿，繁若星辰。三十年后，名人传记，汗牛充栋。我却以《村官通鉴》主题立意。《村官通鉴》是一本很难分门归类的书，因为形式必须服务于内容，又加之容量的约限，所以权宜选体，素纸裹花，成了今天的样式，边缘门类，聊称创新吧。

全书分上、中、下三编。

上编《村官本纪——走向李德海》，记李德海的身世身历和业绩。

三十年来，无数媒体记者的笔触对准了李德海，发表的文章和书

籍不计其数，李德海成了举国闻名的充溢着传奇色彩的人物。褒奖歌颂有加，当然也不乏批评挑剔之笔，但都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笔者清楚，谁也写不出一个真正的李德海，因为我们谁都没有亲历过他那些苦难、磨砺和实践，不可能真切体味到他那种情怀，因而也升华不到他那种境界。有时我们自觉写得很真，但却不是。

再则，我们既没有结论的资格，也没有结论的义务，那是历史和人民的事。

高贵与生俱来，但高贵的种子需要打拼和磨砺。

李德海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这样的：强烈的自我，神圣的责任。超前的意识，脱拔的境界。龙虎的野心，山脉的毅力。挺拔的身躯，睿智的头脑。逻辑的思辨，悬河的口才。钢铁的手腕，一统的天下。静如泰山，动若雷电。不谄权贵，不媚流俗。满腔烈火，大爱大恨。爱民如子，疾恶如仇。是一位罕见的有胆有识、文韬武略兼而有之的农民领袖。

但这种品格，是用六十多年的时间打磨出来的。

李德海首先是一个劳动者，拓荒者，改革家。

他8岁开始参加劳动，中国的主流行业——工农商学兵他样样干过，而且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苦寒的出身，不平的世道，使他由悲悯自己，进而悲悯西关的农民，乃至全中国的农民。吃不上饭，可怜。直不起腰，可悲。于是他发誓不但要让农民吃上饭，而且要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扬眉吐气。

话语权和行为权是夺得的，没有谁会赐予。

于是，1971年，他夺取了西关四队队长的权力，继之又以耀眼的业绩夺得了村支书的权力，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西关成为李德海的一统天下，改革的舞台。

当安徽小岗村开始包产到户的时候，当安徽的改革实验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李德海的经济小船队早已风平浪静地启航了。当三中全会后，全国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候，李德海顺势驾驭远洋巨轮，乘风破浪，中国农村改革的潮头上，傲立着李德海。